

东西问 | 黄纯艳： 宋代“海洋大国”如何以贸易联结世界？（下）



宋代钱币“崇宁重宝”。中新社记者 张炜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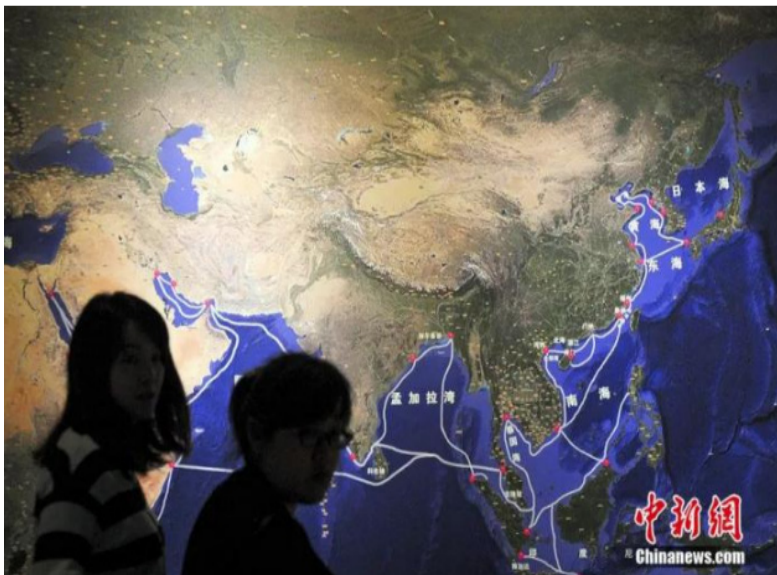
日本博多也有相当规模的宋商人居留，他们集中居住地被称为“宋人町”“唐坊”。东南亚地区的宋商人则更多，也有居留不回者，“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

中国海商成了亚洲海洋贸易中与阿拉伯商人并驾齐驱的主导力量，在中外交流以及亚洲各国交流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是经济交流，日本、高丽与宋朝的贸易，主要力量是中国海商；在东南亚，宋朝商船入港便会掀起贸易高潮，“蛮贾丛至，随簸箕搬取物货而去”。中国海商还将从南海贩运来的商品转销到日本、高丽，将南海和东亚海域整合到一个贸易体系中。

其次，文明传播上，宋代中国不仅经济繁荣，而且制度成熟，文化昌明，被东亚诸国视为学习榜样。高丽、交趾等国积极吸纳宋朝文明中

的文官政治、科举制度、州县学等诸多方面的新变化，完善本国制度；海商也从高丽、日本将多种宋朝已佚的“先秦古书”等经史书籍及其本国书籍传入中国，如日僧裔然带来其国《职员令》、《王年代记》各一卷，宋商周文德带来日僧源信所著《往生要集》等。海外诸国商人还将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等多种宗教信仰带到中国。

再次，官方使命传达。宋朝与诸国官方常常利用商人传达使命。宋神宗即位后



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想重新开启中断了40余年的宋、丽官方交往，就是通过福建商人黄真等向高丽传达意图而促成的。宋朝与诸国通好有利于商业贸易，商人乐于积极在两国官方传达信息，甚至每“知朝廷遣使，争谋以轻舟驰报”。

中新社记者：宋代海外贸易包容开放，对当今有何启示？

黄纯艳：宋代海上贸易政策相对开放，不仅欢迎外国商人来华，而且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在中原王朝海洋政策演变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这给本国和亚洲海洋贸易带来了巨大变化，其中的历史经验于今仍具有重要启示。

只有开放，才能更好地认识海洋，认识世界，融入世界。宋代中国人的海洋实

践空前发展，带来海洋知识和观念的巨大更新发展。宋代仍延续着基于想象的“九州-四海”的海洋观念，但海洋实践建构了不同的知识观念，宋人已经对东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方位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对海上诸国的物产、市场、风俗等有了明晰的了解，增进了不同信仰、不同习俗、不同制度间的人类互利交融的多元观念。而中国海商参与推动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的进步更是成为海洋各国共同的财富。数量空前的中国人经商或留居于海外各国，中国港口也聚居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信仰的外国人。

宋代的海洋经验也说明，实行开放的海洋政策有利于孕育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新因素和新观念。宋代的滨海地区已经逐渐生成向海取利的生

计方式，一些滨海地区逐步形成了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人们的习俗、观念和信仰也随着生计方式改变而变化，衍生出丰富多样的海洋信仰和日益兴盛的商业观念和营利意识，发展出独资、合资、雇佣、租借舱位等多样的经营方式。这些新的生计、习俗和观念，成为地域文化的有机构成，形成历史新潮流。

积极开放的海洋政策使宋代中国和海洋各国互惠互利。宋代开放的海洋贸易政策，使宋朝与海上诸国300余年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的贸易关系。宋代亚洲海洋贸易发展所催生的互利共赢理念和贸易机制，为此后亚洲海洋贸易的持续发展，日益繁荣奠定了基础。（完）

中新网



泉州清净寺创建于公元1009年，公元1309年由伊朗艾哈默德重修，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形式建造，是海商文明传播的见证。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